

不求甚解

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

詹福瑞 著

考证与识浅
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
从艺术的立足点看
跨越文学的批评
一篇锦瑟解人难
对诗圣的同情之理解
最为难得是常情
于人情世情处勘入
美从何处寻
生命力的穿透
诗性的学术论文
武侠研究：游走于作者与读者之间
精到而有分寸的人物分析
诗史互证与诗人的伟大与否
谁解其中味
抓住小说的魂儿
解剖作品与解剖社会
妙悟与熟参

不求甚解

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

詹福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詹福瑞.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0

ISBN 978 - 7 - 101 - 06295 - 3

I. 不… II. 詹…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435 号

-
- | | |
|------|--|
| 书 名 | 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 |
| 著 者 | 詹福瑞 |
| 责任编辑 | 宋志军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34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295 - 3 |
| 定 价 | 49.00 元 |
-

前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轫期，研究的日臻成熟期。小书选取的就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十八篇文章，以随笔的形式总结它们的研究经验，而且也参与到研究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来，直接解读作品。不求甚解，自有我本人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文章知之难、解之更难的感慨之意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表明，面对一般读者阅读经典，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

好读书，不求甚解，本来是陶渊明的一种人生态度，并不是什么读书的方法。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的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在一种不经意中的发现和所得。前者是在不经意中心灵与自然交会，后者则是不经意间人与书的会意。这些都是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生的一种体悟：人既然皆在大化之中，就应不拘执什么，不苛求什么，不过望什么，一切皆任其自然，这样才会有人与自然、人与书的零距离接触，才会达到欣然忘食的境界。我想这应该是陶渊明写这句话的初衷吧。

但是后来的人们却把这样的一句话，坐实成读书的方法，而且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不求甚解》一文，此杂文自有其弦外之音，意不在求解这句话本身的含义。文中引了他的老师对这句话的讲解：“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这应该是最接近于两晋和南朝人读书状况的解释。因为这一时期士人读的书主要还

经书。而读经，就离不开章句之学，就要读大量的注疏。即使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以义理为主的玄学，也多是通过注解经书以及其他经典而阐发义理的。所以避开注解，直接去读文本，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态度。至于邓拓在《燕山夜话》里说，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是说读书要讲会意，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那就是针对当代人而谈的读书体会。而钱锺书《管锥编》引杜甫《漫成》诗“读书难字过”、培根“书有宜囫囵吞枣者”，则似调和于鲁迅老师与邓拓的说法之间，来解这句成语的。不卡在难字上，掌握大意即可，就叫不求甚解。

二

用“不求甚解”名书，自然不是再回到陶渊明的本意讨论人生问题，而是借用这句成语，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有利于经典阅读的问题。

既然提出不求甚解，那就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甚解”。所谓甚解，就是深解，时髦地说即所谓的过度阐释，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的一种现象。《西游记》本来就是游戏之作，却有一些和尚、道士和读书人，偏偏把它说成禅门心法、金丹妙诀、理学书，所以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中就批评这种对小说宗旨的过度阐释，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然而对待《西游记》的过度阐释，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建国以后，反而有了变本加厉之势，孙猴子摇身一变，成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不过由于阶级的局限，后来受了招安，反而去打和他一样出身的阶级兄弟——妖魔鬼怪了。当然这是在文学研究偏离学术轨道下的变态，然而，恢复常态下的研究，也没有走出去多远：抱住政治的，高歌反抗、正义；追求哲理的，又挖出了宗教、心学。不把作品搞得很沉重，不放心，也不甘心。在所有的小说研究中，对《红楼梦》的深入挖掘，更是触目惊心。把这部家庭小说，上升到政治历史小说高度，是过度

阐释的极致。视《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并不完全是领袖提倡的原因，更早的源头，恐怕与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文化思潮有关，因此反封建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就代表了封建制度，贾政成了封建家族的代表，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他们周边的丫头们自然就成了受封建制度迫害的一群，贾宝玉和林黛玉又成为反抗封建制度迫害的叛逆者。更有甚者，有的研究，把贾宝玉描绘成具有了民主意识的斗士。似乎不如此，小说的身价就不会高，而其实如此甚解，恰恰会屏蔽掉作者为之流下“心酸泪”、渗透在“荒唐言”中的“其中味”，即作者的人生体验与感悟。陈独秀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红楼梦〉新叙》中有这样一段话：“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的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叙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他强调批评文学作品的旨趣，要把《红楼梦》作为“善写人情”的小说来看，可謂是过度阐释《红楼梦》的对症针砭。

还有对诗词的研究，一个比兴寄托不知迷糊了多少人，深陷于过度阐释中不能自拔。正始诗人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逼得他不得不佯狂避世，《咏怀诗》八十二首表现了他内心的痛苦与解脱。阮籍的忧生之嗟，多比较隐晦，如鍾嵘《诗品》所评：“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在《文选》注中也感慨：“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就给过度阐释提供了机会，五臣注《文选》阮籍《咏怀诗》，就说阮籍忠于魏室，他的诗多是刺司马文王的。到了清代的何焯、蒋师淪就更说的阮诗几乎无不与魏晋政治有关了。近人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亦不出此窠臼。陈伯君校注《阮籍集》，多有廓清，但是至今仍有坚持阮籍忠于魏室、其诗与此有关者。比如《咏怀》第七首：“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謝，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张铤注解道：“三旬，谓六月之旬，将入于秋也。喻魏之末，权移于晋。”这是

最早把此诗与魏晋易代的政治联系起来的注解。到何焯则更进一步演变为具体的事件：“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常道乡公立，改元景元，月之三日也，故曰三旬，四时代谢，以比易代。”陈沆亦持此说，而在解释诗的最后两句时，又给阮籍加了“危其复为齐王、高贵乡公之续也”的忧虑。对于这样的注释，陈伯君以“不知常道乡公之立，下距魏晋易代尚有五年”，以辨何注的曲解。然而今人仍不乏相信何、陈两人之说者，或解为忧魏祚将移于晋，或解为希望常道乡公曹奂能保持好和司马昭之间的关系，不要像曹芳一样被废，更不愿像曹髦一样被杀死。其实这首诗并无政治含义，就是有感于夏去秋来，四时代谢，一人独居，少有人了解他光阴易逝的痛苦，希望亲友常聚一堂，少些别离。这样解既于诗不隔，而且使人感到亲切。李善注此诗说：“言四时代移，日月递运，年寿将尽，而人莫已知，恐被谗邪，横遭排斥。”可以说解对了一半。但是人们就是不肯把诗意想简单了，可见想要把诗解浅了，比解深了还要不易。此书特意选了苏雪林的《玉溪诗谜》和詹安泰《论寄托》两篇论著。历来关于李商隐的诗就有难作郑笺之慨，这是因为李商隐的诗、尤其是类似《无题》的诗含蓄到了一种审美的极致，意象纯美而又组合复杂。由于李商隐一生中与牛党李党都有关系，仕途又比较坎坷，所以诸多研究者抓住了这一点，把所有的《无题》诗以及类似的诗都说成了李商隐深陷牛李党争的身世之慨。而苏雪林则站在了《无题》为恋爱诗的一派，考证玉溪与女道士及宫女的爱情。我并不赞许苏氏非得用大力气考证李商隐和某一位宫女或女道士谈恋爱的研究方法，但是认为他把玉溪的诗从身世说中解放出来，看出了其中的爱情气息，是值得肯定的。词兴起之初，主要是表现儿女之情的，所以婉约一直是词的正宗。北宋中叶，词逐渐雅化，身世之感开始入词。到了南宋，江山半壁，社稷岌岌可危，家国之念大量写入词中，寄托遂多，然而小儿女之情仍不肯离词远去。但是到了清代的常州词派，把比兴寄托强调到无寄托不可言词的地步。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本来就是写一个贵妇人起床时的慵懒之态的，而张惠言偏偏说“照花前后镜”是

《离骚》“初服”之意。所以夏承焘在《唐宋词欣赏》中批评说：“那无疑是附会太过了。”不过夏先生并没有完全割掉常州派无寄托不入的尾巴，他老人家又说了一句，“这里面也可能暗寓这位没落文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还没有完全摆脱常州派的心理暗示。詹安泰论词的寄托，是比较客观的，也认为并非所有的词都有寄托。不过说到具体的作家时，也难逃寄托的阴影。说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寓身世家国之怀”。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指的是宫廷；“雨狂风骤”，指群小。也有过度阐释之嫌。

三

对文学作品的“甚解”，不仅指过深求解，还有旁解。甚解还仅限于望风扑影，影子自是过度阐释的依据。或者是作家生平、思想，或者是作品内部，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些信息，可供其甚解者。而旁解则是无中生有，多属臆测。

汉人说《诗》，不但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也注意到了诗的言情特征和感染性，有了风雅颂和赋比兴之分，此时的《诗经》其实兼具文学文本和社会教化文本的性质。而汉人说诗围绕诗序展开，其路数就是每首诗都要附会以诗的本事。这些诗的本事多半属于旁解。比如《关雎》，汉人解诗，说君子是指文王，淑女是指太姒，诗歌颂的是太姒的“后妃之德”。为什么君子非指文王、淑女非指太姒不可呢？没人可以作有根有据的解答。今人解释这首诗，虽然不再相信汉人的解释，由旁解回到了正解，却又守住了“贵族青年男女”不再敢后退。套用顾颉刚批评清代汉学家的话，一只膝刚从汉代人旁解的面前站起来，另一只膝又向甚解的面前跪了下去。当然，自宋代开始，就有了对诗序的怀疑和质疑，引发所谓的存废序之争，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出现，才真正要把《诗经》从经学中解放出来，归还诗的文学本相。对《诗经》的解读，才由旁解回归到了文学解读的正路。胡适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没有文学的鉴赏

力与想象力的人，不能读《诗》。”从书中所选的胡适文章《谈谈〈诗经〉》，即能够看到上个世纪20年代的学者是怎样破除《诗经》的神圣，拆解附在《诗经》上面的附会之词，使它回到文学、回到民间的。

在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类似汉人说《诗》一样的诗词研究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偶尔也见李白与杨贵妃搞恋爱、杨贵妃逃到了日本的奇谈，但是那只能算作野狐外道，不应入研究之流的。但是在小说研究中，旁解却兴起了不小的风浪，尤以《红楼梦》最甚。过去，围绕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兴起了曹学，虽然繁琐得令人生厌，但对于理解作品，还有助益。近时又因为秦可卿，扇乎起了秦学，要钩沉、解密一段史书不载、更不为人知的清宫秘史，热了一时，其实已经与《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毫不相干了。

旁解里，还有另外的一种类型，就是拿诗、拿小说说别的事儿，如郭沫若、孙作云以《诗经》作为史料，研究周代社会。《诗经》已经不是文学文本，而成了史料。闻一多用《诗经》考察原始文化与宗教，也是如此，研究目的不在文学，应另当别论。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孔子、孟子说诗也多属此类。

四

思考古代文学研究中过度求解的原因，大概来自两个方面。

对文学的理解有偏差。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强调文学所表现的激情，忽视文学所反映的个人生活和情感，忽视人间之常情。于是调动起了研究者的积极性，非挖地三尺，掘出深刻的思想意义不可；深怕止于个人生活，止于常情，贬低或缩小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我国自古就有重诗教的传统。认为诗教化人既快又深，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作用，所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再也没有超过诗这样的工具。魏文帝曹丕虽然如鲁迅所说，要为艺术而艺术了，但他还是把文章抬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

度。至于后来，诗要比兴，词要雅，文要载道，小说要劝戒人，一直到今天，强调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促使文学研究者非掘地三尺不可，否则就是水平不到，责任不到。

另一个原因，恐怕与学科历史太久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与现当代文学相比，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学科成熟，如同一个人有了一把子年岁，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办事也就有谱。学科也是如此，成熟之后，学术规范也就建立起来，一篇论文，应该如何搜集材料、处理材料，如何引文，如何注释，都有了一套固定不变的路径和套路。所以只要经过这一套的训练，都会走上古代文学研究之路，甚至都可以或多或少做出成绩来。所以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出了很多，以至常常听到博士论文选题越来越困难的感叹。古代文学研究的确是越来越难了，百年的积累，对于经典有了过多的阐释，不超越前人，研究就是炒冷饭，没有任何意义。超越前人又谈何容易？所以要么独辟蹊径，打所谓的空白；要么，就得在三尺之下再掘三尺，说出别人不曾说过的意义来。

五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今天似乎已经不说自明。但是，从近些年的文章看，古代文学研究对于读者阅读的帮助和引导，已经被一些研究者忽视了。我们只顾低着头去搞学术了，至于研究的成果对于读者阅读作家作品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则少有人去思考。

文学研究的确应该为读者阅读作品提供帮助。古代文学距离我们现代生活越来越远，它们就像天空的星斗，眨着神秘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既亲近而又陌生。研究者对于历史背景的描述，对于作家生平事迹的梳理，对于书中涉及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的注解，甚至就是难字难词的注释，都会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也许更欢迎更需要古代文

学研究者站在与他们相同的起点，带他们走进作品，共同去体验作家的喜怒哀乐，去感受作品的美。一般读者需要的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通的同情之理解，与他们的接受相适应的平易之论说。研究者对于作品故作高深的过度阐释，不仅会对读者正确理解作品发生阻隔，甚至至于败了读者的阅读胃口。想想看，除了少数的学者，有谁耐烦去到《西游记》中体验什么禅宗心法、金丹妙诀？去到《诗经》里寻找什么美刺之义？所以，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并不是研究得越高深、越偏僻越好，而是越贴近作品的实际，越贴近生活的实际，越能被接受，越发挥更大的作用。

学科成熟，固然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进步，是学术发展的福音，但是近些年来也渐露学术研究僵化、刻板之象，有的研究甚至离文学渐行渐远，变成了文献的堆积、思想的演绎。然而离开生命的本体，离开灵魂的此在，离开语言的艺术，离开审美的感受，文学研究变成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草创到逐渐成熟的阶段。草创时期的文学研究，自然有很多的幼稚，有的甚至还不知何为规范。但是，却也有它原始时期的感性和鲜活。

本书所选的十八篇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离文本，重视对作品的分析。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虽然不离反封建的基调，认为《红楼梦》是以贾府为中心，来作清朝康、雍、乾时代统治阶级的镜子，这正是作者的伟大之处。但是太愚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史湘云、袭人、晴雯、李纨、秦可卿，以至贾府的老少爷们、太太奶奶们、奴仆们，一个个却都是从作品出发，把握人物的性格、心理，把握作者描写人物的特点。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练达世事，所以讨论人物不仅极为深刻，而且也不乏生动。譬如，他分析贾宝玉：“宝玉是作者笔下最主观性的角色。他是贾府家系的命脉，是恋爱故事的中心，也是人生哲学的说教者。作者以宝玉来反映贾府家庭的命运，反映许多女性的情感生活，反映当时贵族阶级优异青年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并且以宝玉的尺度批判着书中的许多人物。”

仅仅数语，就把宝玉形象在书中的位置，精炼地概括出来。还有王熙凤这个形象，太愚分析到：“王熙凤是作者笔下第一个生动活跃的人物，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充沛的角色，是封建时代大家庭中精明强干泼辣狠毒的主妇性格的高度结晶品。”“《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也是很形象地概括出了凤姐聪明、漂亮、能干、泼辣、狠毒的性格特点，以及她在读者心中的印象。如果读者在读《红楼梦》之前，看到太愚的人物分析，会有助于他们准确地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有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研究很抽象的魏晋风度，他不似今人那样，玩弄玄学，把魏晋风度说得玄而又玄。而是描述魏晋人服五石散、喝酒、穿衣等生活现象，揭示魏晋风度的内涵以及文化思潮。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考察陶渊明的新自然主义，也主要是从分析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切入的。因此这样的研究，是比较适合一般读者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参考的。

另一个特点是文学研究的个性色彩特别突出：重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参悟，因而也更贴近文学本体。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的诗性特征，不仅表现在用充满诗意的不乏激情的语言描述宫体诗的罪与自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于作品出自诗人的准确而又细微的体验和把握。宫体诗几个发展阶段的论证——卢照邻《长安古意》的晴天霹雳、狂风暴雨，到刘希夷《公子行》的爽朗宁静，再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深沉、宁静、寥廓的宇宙境界——就是建立在闻一多对具体作品的精微判别之上的。方管《王维散论》对王维诗中“并不极端，并不至于寂寞”的安静自然的把握，也带有对具体作品的个人体会色彩。他说《鸟鸣涧》夜静而且山空，但是并不荒凉寂寞，主要是王维笔下的山乃是春天的温和的山，不是萧条死灭的秋山或冬山；有日出，有月光，有鸟鸣，不是浓重的暗，不是沉重的静。是融入了个人感受山水的经验在里边的。而方管分析《鸟鸣涧》的一段话：是因人闲而桂花才落，还是因桂花落而人才闲呢？是人闲了才看得见本就落的桂花，

还是桂花落了才看得见本就闲着的人呢？那就更是个人自问自答的感悟之语了。李长之研究李白、太愚分析贾宝玉的形象，无不如此。这样的研究指导读者的阅读，才有可能把读者真正带进文学作品，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不仅如此，还会培养读者以个人的视觉和经验感受作品，成为文学的知音者。

目录

前言	(1)
考证与识浅	(1)
附:胡适《〈西游记〉考证》	
回到生活本身的逻辑	(37)
附:胡适《谈谈〈诗经〉》	
从艺术的立足点看	(55)
附:胡云翼《宋词研究·词人柳永》	
跨越文学的批评	(71)
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一篇锦瑟解人难	(93)
附:苏雪林《玉溪诗谜》(节选)	
对诗圣的同情之理解	(115)
附:汪静之《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	
最为难得是常情	(147)
附:詹安泰《论寄托》	
于人情世情处勘入	(171)
附:阿丁《〈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	
美从何处寻	(189)

附: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生命力的穿透	(213)
附: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节选)	
诗性的学术论文	(229)
附: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武侠研究:游走于作者与读者之间	(245)
附:范鸥夷《论武侠小说》	
精到而有分寸的人物分析	(261)
附:太愚《〈红楼梦〉人物论·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诗史互证与诗人的伟大与否	(281)
附: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谁解其中味	(311)
附:阿印《林黛玉的悲剧》	
抓住小说的魂儿	(337)
附:李辰冬《〈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意义》	
解剖作品与解剖社会	(353)
附:王璞:《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	
妙悟与熟参	(381)
附:方管《王维散论》	
跋	(399)

考证与识浅



考证与识浅

古人重说教，今人亦然。我国古代有许多好玩儿的书，就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无甚深意，然经过秀才学者之手，偏偏就能生出思想和意义来，这本事真的十分了得。

关于《西游记》主题的争论，自有小说以来就出现了。但我每次读此书，却又很难进入学术界讨论的主题，领会善于挖掘者苦心淘出的深意，什么道教的秘诀，什么禅宗的心法，反理学，反正统，反信仰，反抗精神，斗争精神，等等。只觉得甚为好玩，甚为开心。老辈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少看《西游》，所添的恐怕就是孙悟空玩闹的猴性吧。但是有了学者高深的理论，我们实在不敢把这部名著读浅了，读糟蹋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真实感觉，唯恐它是假相，掩盖了实质。及至看到了胡适和鲁迅这两位导师的认识，才相信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

鲁迅和胡适都是我国现代的思想家，不是普通的学者。但也就是这两位思想家却未从人们谈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记》里看出思想来，反而看出了它游戏的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伽，老君，